斑斓集萃：宋锦的色泽及功用

程民生¹

【摘要】宋代色彩绚丽的锦，是工艺之妙、智慧之美，为中国古代审美最高形式的物质标本，常用来形容美好的事物，是最高等级的赞美。锦色包括五正色和间色之单色，花色约有百余种。宋锦用途广泛，主要有服饰、官告、锦标、锦囊等。锦大多掌握在朝廷手中，用来日常赏赐臣民、紧急购买军需。朝廷常干涉锦的制造与使用，北宋时禁止锦流入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南宋时锦与国防有着密切关系。宋锦多有流传到后代者，令明代人赞赏的仍然是其夺目的色彩。锦是宋代工艺美术的一个结晶，在中国色彩史、彩帛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影响至今。

【关键词】宋代 锦 色彩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 (2022) 05-0042-14

在宋代的色彩文化中，有一种集萃的表现，如同孔雀开屏，那就是最高端的纺织品——锦。锦是用彩色或素色经纬丝经提花等织造工艺织出各种图案花纹的纺织品，将最美的色彩和图画编织凝聚在独特空间，传播到各地有身份的人家，而且能够长期保存，乃是色彩文化的一个标本，有“美锦”“瑞锦”“玉锦”等佳誉。关于宋代纺织品，学术界多有研究，但具体如锦者稀缺；关于宋代工艺品，学术界也多有研究，但具体如锦者也未见史学界的论著。¹笔者不揣冒昧，试从色彩视角观察宋代的锦，以期进入一个新层面，揭示其色彩和文化价值，俟教于大方。

一、宋代锦色之贵美

（一）锦的光彩美

锦之得名，源自于贵金属黄金。“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字从金帛。”^[1]（卷三，P346）所谓“约一锦之费，可为绢数匹”^[2]（卷一〇四，天圣四年七月辛未，P2414），贵重如金，是指用功多，用料精，造价高。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锦的色泽像黄金一样闪亮。从其传说的来源就可看出，色彩是锦最主要的标志：“员峤山环丘有冰蚕，霜雪覆之，然后成茧，其色五采，唐尧之时，海人织锦以献，后代效之，染五色丝，织以为锦。”^[3]（卷一〇《锦》，P537）所谓“五采”“五色”，都是多彩的形容。

锦色之美，贵在鲜艳。与素白色的绢、绸、纱等根据使用对象需要染色不同，锦色不是后染，而是用不同的色丝预织。染是单色，搨染是单色的花斑，不会五彩缤纷。织锦的工艺卓越，色彩、图像斑斓生动：“织文锦绣，穷工极巧。其写物也如欲生，其渥采也如可缀。连薨比室，运箴弄杼，燃膏继昼，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玩。”^[4]（卷三四，吕大防《锦官楼记》，P930-931）锦色浓艳的光泽仿佛可以伸手摘取，故而不仅可服用，还可玩赏。宋代福建建阳有“锦水与建溪会源，虽浅而清，以濯锦色倍鲜莹，人拟之蜀锦江”^[5]（卷三《虚直轩记》，P794）。强调的还是其水漂洗出的锦色“倍鲜莹”，绚丽多彩是锦最可贵之处。

锦色之美，妙在光泽，即色光效果。正如晁说之所指出的那样，“锦贵五色炳耀”^[6]（卷一五《答朱秀才书》，P35），以及杜开所言：“锦者文彩光辉之称。”^[7]（卷二〇，杜开《锦带补注·序》，P534）如道教经典载，王母所穿“黄锦之服，文彩鲜明，金光奕奕”^[8]（卷一一四《西王母传》，P719），赵湘有“锦赫摇帐，珠光动履”^[9]（卷五《迎富文》，P344）之句，表达的都是赫赫光彩。陕西郿延的选锋军“最为骁锐，皆一当百，银枪锦袄，光彩耀日”^[10]（卷三三四《徐禧传》，P10723），阵容晃眼，颇有震撼力。锦之所以有熠熠色泽光彩，得益于编织时不同方向线条版块的反光，也得益于蚕丝。“蚕丝光泽被誉为珍珠之光，象牙之色，即有珠光宝气之称。”^[11]（P14）其效果如同珠光宝气，“珠玑金玉之饰，锦绣

作者简介：程民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开封 475001）

纂组之工”都属于“可以荡心悦目者”。^[12]（卷一三《上太皇太后乞崇俭戒奢疏》，P199）锦之色能使人眼花缭乱，心神荡漾，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诱惑力。即使比喻，同样如此，如夸耀某人教诲，言其“分九经重锦之辉，开明后觉”^[13]（卷六六《代献时可宾兴与乡贡谢彭仲启》，P334），如精美的锦之光辉一样，照耀蒙昧。

（二）锦的风光美

人们常以娇艳的花朵来比喻美好事物，但以宋人为代表的古人却喜欢以锦来形容花朵乃至旖旎风光。

例如：司马光称赞洛阳牡丹：“谁道群花如锦绣，人将锦绣学群花。”^[14]（《伊川击壤集》卷一三，司马光《看花四绝句呈尧夫》，P252）群花竟放好似锦绣，人们织锦时又将花的美好融入，锦与牡丹互动。慕容彦逢也言洛阳牡丹：“如霞如锦色何鲜，映日鼓风特地妍。”^[15]（卷二《和蒋秀才牡丹次韵》，P315）都很鲜艳。晁补之言松溪桃花：“归去未应芳物老，桃花如锦遍松溪。”^[16]（卷一六《鱼沟怀家》，P517）叶茵也云：“锦样桃花占晓晴。”^[17]（卷四一，叶茵《晚梅》，P332）刘蒙言菊花：“有锦菊者，粉红，碎花，以色得名。”^[18]（刘蒙《刘氏菊谱·叙遗》，P286-287）色美谓之锦。白玉蟾也言：“天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19]（《玉隆集》卷七《织机》，P195）荆楚间的海仙花，一名文官花，但因为“有花如锦，遂名锦带花”^[20]（前集卷二七《锦带花》，P556）。升级版的形容是以锦比喻春色，如黄庭坚诗云：“城南一段春如锦，唤取诗人到酒边。”^[21]（外集卷六《戏和舍弟船场探春二首》，P1155）同样用锦形容秋季的斑斓风光，如巴州通江县的秋锦山，“隔江望之如锦，故名”^[22]（卷一八七《巴州·景物》，P3835）。成都有锦城的美称，主因不是产锦，而是“以山川明丽，错杂如锦，故曰锦城”^[23]（卷四上《锦城》，P128）。严州有锦砂村，因“林木森耸，波流澄澈，映石如锦，故以名”^[24]（卷三《古迹》，P564）。刘辰翁甚至说：“天上西湖似锦，人间骏马如龙。”^[25]（卷八《临江仙》，P592）杭州西湖已经美如人间天堂，而天上的西湖却美如锦。至此，锦就是美的极致，妙不可言。这些诗句都表明：在宋人的心目中，繁花似锦，锦色胜过花色，文化色彩胜过自然色彩，人工创造的美超越了自然创造的美。

（三）锦的事物美

其他事物，以锦形容者比比皆是。除羽毛华丽的鸟类锦鸡以外，何梦桂将丹砂比作锦球：“丹砂散地无人收，聚作丹霞如锦球。腾腾五采狎猎起，夜半精光冲斗牛。”^[26]（卷一《赠徐霞翁》，P25）宋真宗举行奉天书赴太庙典礼时，据说“有黄云迎日，若桥梁状，五色云如锦”，大臣们阿谀为“灵瑞纷集，咸上赞颂以美盛德”。^[27]（礼二二之一五，P1124-1125）锦色之云被视为上天的灵瑞。人文方面常用来形容文章之美，似“五色锦之脱机，光夺日月”^[28]（续集卷一五，牟存斋《通丁太守》，P325）。如秦观言三苏之文：“蜀之锦绮妙绝天下，苏氏蜀人，其于组丽也，独得之于天，故其文章如锦绮焉，其说信美矣。”^[29]（卷三〇《答傅彬老简》，P981）夸赞他们的文章“组丽”如蜀绣。陈必复夸奖林尚仁的诗：“子肠腑间岂皆锦绣耶？不然，何其言之多美也？”^[17]（卷三三，陈必复《端隐吟稿序》，P265）也是锦心绣口之意。宋代中散大夫这一官职很特别：“今之中散大夫，即昔之大卿监也。旧说谓之十样锦。受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许封赠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今为令人。不隔郊奏荐，三也。奏子为职官，四也。今为从仕郎。乘马许行驰道，五也。马鞍上施紫丝座，六也。马前执破木杖，七也。宴殿内，金器，且坐朵殿上，八也。身后许上遗表，九也。国史立传，十也。”^[30]（卷一〇《中散大夫旧说谓之十样锦》，P226）有十样优遇，故称十样锦。

锦的鲜丽花样，甚至溢出为其他行业的榜样。如宋代建筑中的彩画，要求“但取其轮奐鲜丽，如组绣华锦之文尔”^[31]（卷一四《取石色之法》，P306）。即如锦般的“轮奐鲜丽”，成为官方建筑彩画核心的美学思想和图案中最基本的装饰元素之一。《营造法式》中带“锦”的术语有多个，如“细锦”“束锦”“晕锦”“五彩锦”“海锦”“净地锦”“素地锦”“四出锦”“六出锦”“四斜球纹锦”“簇六球纹锦”等。^[32]（P94）

总之，无论是色彩、原料、工艺还是用功、价格，锦都是纺织品的最高形式，乃至人工制品的最高级代表，因而常用来形容美好的事物，而且是最高等级的赞美。如锦绣江山、前程似锦、锦衣玉食等。概言之，凡是美好的事物，都可以用锦来形容。甚者，宋人还认为锦集众美于一体，可以配大地之德：“盖锦者，兼众体然后成，集众美然后就，足以配乎地德之大成者也。”^[33]（卷六八，P330）

色彩绚丽的锦，是工艺之妙、智慧之美，斑斓集萃，其文化地位之高，出乎当代人的意料，乃是中国古代审美最高形式的物质标本。

二、锦的色泽与种类

（一）单色锦

五正色之锦全部都有。如青锦、红锦：宋高宗赐给三佛齐国使者的礼品中，有“青锦三百匹，红锦三百匹”^[34]（卷七《赐三佛齐国帛书》，P506）；牵引皇帝玉辂的士兵，“内着绯锦缣衫，全似大神，手扶青锦索，拽玉辂”²^[35]（P118）。黄锦：官告装饰中有的级别用“黄锦裸角轴”^[36]（卷中，P19）。白锦：“素锦，白锦也。”^[37]（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三《陈器》，P328）。黑锦：李煜的南唐“有织成……墨锦裸饰（今绫锦院效此织作）”^[38]（卷六《李主印篆》，P65）。曹辅言王羲之的《二谢帖》，“当用墨锦玉轴重装，以遗子孙宝之”^[7]（卷三九，曹辅《题右军〈二谢帖〉》，P2939）。蜀锦院织有“皂大被”“皂中被”“皂大被褥”等^[39]（费著《蜀锦谱》，P77），都是黑锦。

间色之锦更丰富。如碧锦：皇帝的大驾卤簿中，“茶酒班执从，物帽子，碧锦袄，红背子”，“内殿侍：碧锦袄”。^[40]（卷一四《卤簿·大驾中道》，P185）。绿锦：皇后和皇太子妃礼服中的大带，“上以朱锦，下以绿锦”^[10]（卷一五一《舆服志》，P3535）；元初有僧人“呼童出示绿锦旗，云是先朝敕赐物”^[41]（《题临平骠骑将军庙壁》，P48），是宋朝皇帝赐的绿色长幅锦旗。紫锦：曹勋有“同緘尺素书，封以紫锦囊”^[42]（卷四《遣所思》，P350）的诗句。翠锦：朝廷每年冬天支赐大臣“翠锦衣袄”^[43]（卷一五《乞不请中冬翠锦衣袄状》，P155），毛滂言“夫琴，错以象犀，借以翠锦”^[44]（卷一〇《重上时相书〈之六〉》，P254）。柿红：装裱书画有用“柿红龟背”^[45]（卷下《叙唐宋锦绣》，P25）锦者，等等。

（二）花色锦

锦之为锦，主要在于花色，花色包括色彩和花纹。在这方面，宋锦可谓五花八门，多姿多彩。

由于技术、成本、政策等原因，官方的纺织机构是织锦的主要力量。天圣七年（1029）三司报告：

凡天下州军约支锦色数目：盘球晕锦十六领，方胜宜男细锦二十五领，翠毛细锦二十六领，倒仙细锦一领，盘球云雁细锦六十二领，簇四雕儿细锦八领，黄狮子大锦五十七领。以上并在京织。方胜练鹊大锦二百二十四领，青州织；红团花大锦五百五十五领，真定府织；红团花中锦千二十二领，在京及真定府织；青荷莲锦三十三领，在京织；黄花锦七十四领，西京及真定府织。^[27]（仪制九之三二，P2494）

系统展示了当时官方支赐臣僚锦服的花色、数量和织造单位。其中绫锦院等朝廷作坊织造盘球晕锦、方胜宜男细锦、翠毛细锦、倒仙细锦、盘球云雁细锦、簇四雕儿细锦、黄狮子大锦、红团花中锦、青荷莲锦，凡9种；河北路真定府织造红团花大锦、红团花中锦、黄花锦，凡3种；京东路青州织造方胜练鹊大锦，凡1种；西京洛阳织造黄花锦，凡1种。四地共12种花色锦，开封最多，真定府其次，青州、洛阳最少。件数以真定府最多，约1103件³，其次开封约739件，青州224件，洛阳37件。以上情况说明两点：一是开封、真定为北宋最主要的官营织锦基地，二是官用锦产地全在北方地区。

四川官营织锦后来居上，规模较大。据元人回忆，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地方官在成都设立锦院以后，“当时所织之锦其别有四，曰上贡锦，曰官告锦，曰臣僚袄子锦，曰广西锦，总为六百九十疋而已”。总数并不多，其中广西锦，是运到广西用于和少数民族换马匹，属于商品。具体花色与数量如下：

上贡锦三疋花样：八答晕锦。

官告锦四百疋花样：盘毬锦、簇四金雕锦、葵花锦、八答晕锦、六答晕锦、翠池狮子锦、天下乐锦、云雁锦。

臣僚袄子锦八十七疋花样：簇四金雕锦、八答晕锦、天下乐锦。

广西锦二百疋花样：

真红锦一百疋。大窠狮子锦、大窠马大球锦、双窠云雁锦、宜男百花锦。

青绿锦一百疋。宜男百花锦、青绿云雁锦。

茶马司锦院织锦名色。《茶马司须知》云：逐年随蕃蛮中到马数多寡，以用折传，别无一定之数。）

黎州：皂大被、绯大被、皂中被、绯中被、四色中被、七八行锦、玛瑙锦。

叙州：真红大被褥、真红双连椅背、真红单椅背。

南平军：真红大被褥、真红双窠锦、皂大被褥、青大被褥。

文州：犒设红锦。

细色锦名色：青绿瑞草云鹤锦、青绿如意牡丹锦、真红宜男百花锦、真红穿花凤锦、真红雪花球露锦、真红樱桃锦、真红水林檎锦、秦州细法真红锦、鹅黄水林檎锦、秦州中法真红锦、紫皂段子、秦州粗法真红锦、真红天马锦、真红湖州大百花孔雀锦、真红飞鱼锦、四色湖州百花孔雀锦、真红聚八仙锦、二色湖州大百花孔雀锦、真红六金鱼锦。^[39]（费著《蜀锦谱》，P75-77）

就其数量而言，主要是官告锦和商业性的买马、招待奖励少数民族首领的犒设等锦；就花色而言却十分丰富，多达 47 种，是北宋各地制造官服花样的近 4 倍。其色彩以红色（真红 17、红 1、绯 2）为主，其次是青绿（青绿 4、青 1、翠 1），黑色（皂 2），另有鹅黄与紫色。所谓川红，即海棠花般的红色，是四川最有特色的色彩，故而宋人有言“世之重川红”^[46]（卷一五《川帛宜色》，P461），受到全国的喜爱。

皇帝祭祀时的服饰中，还出现“龙鳞锦”“紫云白鹤锦”“锦龙标、领”以及“青碧锦织成天河带，长一丈二尺，广二寸”^[10]（卷一五一《舆服志》，P3522、P3527、P3528）等，都是罕见的品种。南宋初年，张俊献宋高宗锦百匹，其中有“捻金锦五十匹”^[47]（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四帛》，P127）。捻金锦是以丝线为胎，外加金箔而成的金缕线，所织锦自是金光闪闪。明人记载看到的宋代装裱书画所用锦，名色琳琅满目：

宋之锦标，则有刻丝作楼阁者、刻丝作龙水者、刻丝作百花攒龙者、刻丝作龙凤者、紫宝阶地者、紫大花者、五色簪文者、紫小滴珠方胜鸾鹊者、青绿簪文者、紫鸾鹊者、紫白花龙者、紫龟纹者、紫珠焰者、紫曲水者、紫汤荷花者、红霞云鸾者、黄霞云鸾者、青楼阁者、青天落花者、紫滴珠龙团者、青樱桃者、电方团白花者、揭方团白花者、方胜盘象者、后路者、袖者、柿红龟背者、樗蒲者、宜男者、宝照者、龟莲者、天下乐者、练鹊者、方胜练鹊者、绶带者、瑞章者、八花晕者、银钩晕者、细红花盘雕者、翠色狮子者、盘球者、水藻戏鱼者、红遍地杂花者、红遍地翔鸾者、红遍地芙蓉者、红七宝金龙者、倒仙牡丹者、白蛇龟纹者、黄地碧牡丹方胜者、皂木者。^[45]（卷下《叙唐宋锦绣》，P25）

所列共 42 种，其中明显的色彩，包括紫色 10，红色 6，青色 4，白色 3，黄色 2，翠色 1，黑色 1。由此可见宋锦花色品种之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

锦是丝织品，更是艺术品，创新是其生命力的体现，工艺、图案、色泽可以因地不同，因人不同，因时不同，其花色远远不

止上列数目，估计约有百余种。北宋中期历仕三朝的士大夫沈立，作有《锦谱》一卷，著录于《宋史艺文志》^[10]（卷二〇五《艺文志》，P5206），惜已失传，故难以得悉全貌。

三、锦的功用

宋锦虽然高档珍稀，但用途广泛，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服饰

作为纺织品的锦，主要用于服饰面料，一般而言，锦衣是最高等级的服装。

朝廷设置有绫锦院，“掌织红锦绣，以供乘舆凡服饰之用”^[10]（卷一六五《职官志》，P3918），专门供应皇家服饰所用。皇帝的衮冕之制中，“冕版以龙鳞锦表”，“加紫云白鹤锦里”；后妃之服中，有“大带随衣色，朱里，紕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皇太子妃也是“大带随衣色，不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10]（卷一五一《舆服志》，P3835）由此可见一个奇怪现象，尽管绫锦院织造“御服”^[27]（食货六四之二一，P7743），但宋代皇家似没有锦制衣裳，仅有少量装饰。皇祐年间，最受宠的张贵妃穿着知益州文彦博进献的“灯笼锦”见皇帝，宋仁宗惊顾曰：“何从得此？”^[2]（卷一七一，皇祐三年十月庚子，P4115）可知锦衣很少见于宫中。宋太祖“乘舆服用皆尚质素，寝殿设青布苇帘，宫闱施布幕，无文锦之饰”^[48]（卷一一，刘述《上神宗论百姓侈靡乞身先俭约》，P97）。至少在宋初宫中也没有锦饰。北宋中后期孔武仲有年冬季在皇宫后殿朝参，诗云：“广殿沓寥边，鸣靴趁静鞭。中霄黄道直，诸御锦袍鲜。”^[49]（孔武仲集《十二月十二日后殿朝参》，P180）所言“诸御”，或指嫔妃、警卫，仍非皇帝。

朝廷锦制服装，大量应用于百官时服。宋初沿袭五代旧制，每年赐给将相、学士、禁军大校等高官时服。建隆三年（962），宋太祖感到赏赐不均：“百官不赐，甚无谓也。”于是扩大到所有官员，“乃遍赐之”。此后每逢端午、十月一日，分两次赏赐不同品级官员不同等级的锦衣。类别与等级大约有翠毛、宜男、云雁细锦，师子、练鹊、宝照大锦、宝照中锦，凡七等。但具体情况与名称有所不同。

有14种锦，除了宋真宗新增的以外，其排列顺序大约就是档次的顺序。从建隆三年到太平兴国年间、景德元年（1004），不断扩大赐锦服的人群，意味着织锦的发展，使皇帝得以不断加大赐锦的力度，充分发挥锦服的激励和福利作用，增强统治队伍的凝聚力。

但到了南宋，国情发生巨大变化，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所有朝廷服用一律从简：“掇拾散逸，参酌时宜，务从省约。凡服用锦绣，皆易以纈、以罗。”^[10]（卷一四九《舆服志》，P3478）大幅度削减用锦范围，反映了国力的衰弱。如仪仗队中，“旧用锦袄子者以纈缁代，用铜革带者以勒帛代。而指挥使、都头仍旧用锦帽子、锦臂袖者，以方胜练鹊罗代”^[10]（卷一四五《仪卫志》，P3407）。则是北宋时多是穿锦袄子、戴锦帽子、锦臂袖，政和中大祀飨立仗，车驾执绳人“并锦帽、五色纈绣宝相花衫、锦臂鞲、革带”^[10]（卷一四三《仪卫志》，P3374）。即是军队中多有锦色，如苏轼在密州打猎时，军士们“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50]（熙宁八年，P146），到处锦光闪闪。

饰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绶带。宋朝《衣服令》对官员佩戴绶带质地的规定是：“乘舆及皇太子以织成，诸臣用锦为之……绶有晕锦、黄师子、方胜、练鹊四等之殊……分官为七等，冠绶亦如之。”臣僚绶带全部用锦^[10]（卷一五二《舆服志》，P3554、P3555）。

以上七等锦绶，按照图案区分高下，色彩没有等级分别，只有职责的分别，普通官员一律红锦，唯从事刑法的官员用青锦：“今制，朝服用绛衣，而锦有十九等，其七等绶谓宜纯用红锦，以文采高下为差别。惟法官绶用青地荷莲锦以别诸臣。”哪些官职属于法官呢？也有明确规定：“今御史台自中丞而下至监察御史，大理卿、少卿、丞，审刑院、刑部主判官，既正定厥官，真行执法之事，则宜冠法冠，改服青地荷莲锦绶。”^[2]（卷二九九，元丰二年八月甲子，P7292）目的是为了显示司法官员的严肃性。

民间服饰用锦较为普遍。黄震曾言：“‘织’者，先染丝然后织，若锦之属，功多色重，士贱，不得衣之。”^[51]（黄氏日钞卷二〇《谈（礼记）》，P828）说的是先秦社会制度，并非宋代。与朝廷赐锦服放开一样，宋代民间服锦也是开放的，没有贵贱之分。例如宋真宗曾“赐澶州父老锦袍、茶帛”^[10]（卷六《真宗纪》，P110）。天下乐锦是高级锦，民间也可以用之于婴儿服装，黄庭坚言：“天下乐锦极佳，适嗣直去年得男，夫妇极欢喜，来寻此锦作儿衣，即转施之矣。”^[21]（续集卷六《与范长老（之一）》，P2046）将友人赠送的天下乐锦给新生的孙子做衣服。还有人家用“锦绷婴儿”^[52]（文甲卷一《五郎君》，P718）。甚至有奢侈的官员用锦制袜：宋初武将曹翰即“性奢侈，常着锦鞵金线丝鞵”，遭到“千金包汗脚，惭愧络丝娘”^[53]（卷下《十指仓》，P92）的讥刺，指责其暴殄天物。

（二）官告

官告是官员、命妇的委任状，事关朝廷权威和官员荣誉，制作精良美观，以不同色彩的锦装裱，故而专有官告锦。

宋徽宗大观初，制定官告装裱新格：“凡文武官绫纸五种，分十二等。”^[10]（卷一六三《职官志》，P3842-3848）

以上官告锦裱共九种，文武混用。其中文官分八种，武官仅分四种，唯一与文官不同的是大锦裱。总体原则是“品位愈高，则物采愈华”^[54]（丙编卷二《告命》，P261），即越高贵越华丽。此外，宫掖至外命妇纸七种，分十等，只有八答晕锦遶韬、翠色狮子锦标韬、云雁锦标韬、法锦标韬、锦标韬五种。^[10]（卷一六三《职官志》，P3844-3845）庆历四年（1044）宋夏和好，宋朝封元昊为夏国主，“册以漆书竹筒，籍以天下乐锦”^[10]（卷四八五《夏国传上》，P13999），重大册封当然需要锦的渲染。

民间不乏效仿者，如道教的中元金书九天“宝诰丹书黄上告文墨书纸素，皆可用绫锦之属装背，如今世告敕样。度魂夜宣讫，给付亡灵”^[55]（卷四五《九天宝诰告文》，P637）。以天神的名义仿照世间朝廷的圣旨，超度亡灵。

（三）锦标

生活中常见的是锦标，即锦制的旗帜，通常为竞赛获胜的标志，简称标，竞赛又称夺标。邓深《七夕竞渡》诗云：“水马相先急画桡，朱楼红粉宴笙箫。月中谁念穿彩线，江上齐看夺锦标。”^[56]（卷下《七夕竞渡》，P4）宋代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至元代王振鹏仿作时直接称《锦标图》。

锦标更多地被比喻为科举夺得状元。所谓“来岁锦标先夺得，天街听唱状元声”^[57]（卷六《次韵袁州郑守鹿鸣宴》，P130）。宋初孙何、孙仅弟兄俩“学行文辞倾动场屋。何既为状元，王黄州览仅文编，书其后曰：‘明年再就尧阶试，应被人呼小状元。’后榜仅果为第一”，黄州复以诗寄之：“病中何幸忽开颜，记得诗称小状元。粉壁乍悬龙虎榜，锦标终属鹤领原。”^[58]（卷二，P27）王禹偁祝贺孙仅夺得锦标成状元。宋庠青年时随父亲应山县令宋杞寓居安陆，高中状元，宋人记“今城中锦标坊即其居止”^[22]（卷七七《德安府·人物》，P1938），则锦标又成了纪念、炫耀的地名。宋代还创造了词牌《锦标归》。在宋人心目中，锦就是纺织品中的状元。

（四）锦囊

高档珍藏的物品，常用与其匹配的锦作为包装，所谓“锦囊妙计”即其形容。如宋绶“藏书百千帙，传世惟清廉……朱函青锦囊，宝轴红牙签”^[59]（卷二《观宋中道家藏书画》，P35），以青锦囊包书。黄庭坚请著名制墨大家潘谷鉴赏藏在锦囊中的名墨，“谷隔锦囊揣之”^[60]（卷八《潘谷墨仙揣囊知墨》，P153）。开封太平兴国寺佛牙堂有七宝塔，塔内有纯金楼阁，“阁内有纯金筥，方一尺许，以锦绫色色缝物绢等十重裹之”。里面有“纯金小厨子，厨子以赤锦三重裹之”^[61]（卷四，P325），包裹的锦层越多越珍贵。

（五）其他用具

锦类用具繁多，有带类、帘幕类、卧具类、毯子等。如皇帝的仄翟车、安车，都有“夹幔锦帷”“锦帷络带”，大驾卤簿中

王公的辇车有“施红锦帘”。^[10]（卷一五〇《舆服志》，P3502、P3507）朝廷举办的大宴会，“殿上陈锦绣帷帘”^[10]（卷一一三《礼志》，P2683）。每逢皇帝赐酺，“复为棚车二十四，每十二乘为之，皆驾以牛，被之锦绣，萦以彩纛，分载诸军京畿伎乐”^[10]（卷一一三《礼志》，P2700）。不少高档卧具用锦，如灭后蜀以后，宋太祖赐孟昶“锦绣被毡褥二副”，又赐国母李氏和蜀主弟侄“锦被毡褥铺陈全”。^[62]（卷八，P70）宋哲宗赐辽国来祝贺皇帝生辰的使者之物品中，有“华锦之寝衣”“锦被褥”。^[12]（卷三一《就驿赐大辽贺兴龙节使副银钞罗唾孟孟子锦被褥等口宣》，P350）宋高宗幸张俊府第时的礼品中，就有“螺钿合一十具（织锦锦褥子全）”，“犀昆合一十具（织金锦褥子全）”。^[47]（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P126）宋理宗陵被杨琏真迦扒开后，看到其“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锦，锦之下则承以竹丝细簟”^[63]（别集卷上《杨晃发陵》，P264）。元祐初，杨王赵颢、荆王颢被揭发“尝令成都路走马承受宦者造锦地衣……奢侈僭靡至如此”^[64]（卷二二，元祐三年，P549），这是以锦为地毯。也有与毛混织的毯子，刘安上有诗云：“落英回旋雪飞余，谁向庭中细细铺。借与翠娥相应舞，绝胜西蜀锦氍毹。”^[65]（卷一《澄源堂落梅如茵》，P7）看来比较常见。宋仁宗曾诏令非命妇之家的“帐幔、缴壁、承尘、柱衣、额道、项帕、覆旌、床裙，毋得用纯锦遍绣”^[10]（卷一五三《舆服志》，P3576）。实际上反映了权贵人家用锦的普遍与奢侈。

民间婚丧嫁娶等重大事务中，为典礼的隆重常有锦出现。唐穆宗长庆三年（823）“令百姓丧葬祭奠不得以金银、锦绣为饰及陈设音乐，葬物稍涉僭越，并勒毁除”。但到了宋太宗时期予以开放，奉命重订士庶丧葬制度的翰林学士李昉等认为：“臣等参详子孙之葬父祖，卑幼之葬尊亲，全尚朴素即有伤孝道。其所用锦绣，伏请不加禁断。”得到皇帝同意后，遂成宋代新制度。^[10]（卷一二五《礼志》，P2917）显然，适应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需要，允许丧葬祭奠用锦。熙宁年间王安石次女出嫁蔡卞，其妻吴氏因“骤贵，又爱此女，乃以天下乐晕锦为帐。未成礼，而华侈之声已闻于外。神宗一日问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锦帐嫁女？’介甫愕然无以对，归问之，果然。乃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下为佛帐。明日再对，皇惧谢罪而已”^[66]（卷四九，曾纘《南游记旧·锦帐嫁女》，P103）。宋神宗并不是批评王安石违规逾距，只是觉得他作为大儒不宜奢侈而已。

北宋接待辽国使者，原本“燕犒不示以华侈”，但宣和年间王黼为相时，招待金国使者“每张宴，其居辄陈尚方锦绣、金玉、瑰宝，以夸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10]（卷四七〇《王黼传》，P13683）。照此记载，以锦等向女真人炫耀，使之垂涎，萌生了吞占之心，竟成了北宋亡国的一个诱因。

四、锦的管制与流通

（一）锦的分配

由于贵重，锦主要掌握在官方手中，所以存在着分配问题，大致有两种形式。

其一，皇帝和官方的赏赐。

官方织锦都由皇帝和官方支配，大多用于赏赐。

对内，用于赏赐统治集团各级人员。上文所述官员的锦制时服等，就是以赏赐的名义发放的，是最大宗的分配项目。其他名目还有不少，如“外州军士赴京隶役者回日，给锦袍遣之”^[2]（卷七〇，大中祥符元年九月辛巳，P1565），以锦袍犒劳来京服役的士兵。还用来招降。宋仁宗时淮阳军发生兵变，其中不少叛兵逃散，淮阳军判官皇甫鉴“自持锦袍往，当要路呼谕之，至暮，亡者皆集”^[67]（卷三八《故朝散大夫尚书虞部郎中致仕上骑都尉皇甫君墓志铭》，P976）。对逃亡士兵来说，锦袍很有诱惑力。

对外，用于赏赐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者等。元符元年（1098），环庆地区官方“乞锦袄子，准备赐降人，特赐红锦一千，青锦二千”^[2]（卷四九五，元符元年三月庚申，P11785）。用锦袄招徕蕃族归顺。事实证明效果良好。宋初，陕西秦州少数民族首领尚波于杀伤了宋朝砍伐其林木的士兵，宋太祖诏令归还林地，予以补偿，“仍以锦袍银带赐之，尚波于等感悦。是年秋，乃献伏羌地”^[10]（卷四九二《吐蕃传》，P14153）。以锦等为礼品，竟成为换取林地的筹码之一。元丰年间高永能奉命围攻西夏的米脂城，久攻不下，“密遣谍说降其东壁守将，衣以文锦，导以鼓吹，耀诸城下，酋令介讹遇乃出降”^[10]（卷三三四《高永能传》，P10726），锦成为诱惑力很强的招降诱饵。有的情况

下赐锦还是汉化的手段。如北宋时诸番来京贺正旦，其中南蛮五姓蕃“椎髻乌毡，并如僧人礼拜，入见旋赐汉装锦袄之类”^[64]（卷三〇，靖康二年，P810）。对于西北的党项族，更是大量赐予锦绮，其首领德明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圣宋天子恩，不可负也。”^[64]（卷九，明道元年，P199）日本对宋朝的锦比较渴望：“本国要用汉地香药、茶椀、锦、苏芳等也。”^[61]（卷六，P534-535）宋神宗朝通过日本僧人成寻赐给日本皇帝的物品中，有20匹锦：“川合罗云凤细锦二疋、川倒仙细锦二疋、川攢雁细锦二疋、川黄师子细锦二疋、川杂花晕细锦二疋、川簇四金雕细锦二疋、川翠毛白师子细锦二疋、川方胜天下乐细锦二疋、川方胜宜男细锦二疋、川盘球云雁细锦二疋。”^[61]（卷五，P408-409）花色多达10种，都是四川地方特产。

其二，购买军需。

锦等丝织品可以当作代用货币交换商品。宝元元年（1038），因宋夏战争军费紧张，朝廷“出内藏库锦绮绫罗一百万，下陕西路市余军储”^[2]（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乙未，P2879）。以锦等丝织品购买军粮。常规的做法是以锦向少数民族买马，如四川买马监牧司每年“以锦市马于西南夷”，绍兴三年（1133），“或议用重锦，冀多得良马”。^[68]（卷五二《宇文蜀州墓志铭》，P291）后扩展到广西，乃至成都锦院专门织造有“广西锦”。

（二）锦的管控

锦的高端性决定受到官方的管制，民间不能自由流通。

首先是流通的地域限制。宋初沿袭前代的《关市令》，限制锦的流通范围：“锦、绫、罗、縠、紬、绵、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从锦、绫以下，并是私家应有，若将度西边、北边诸关，计赃减坐赃罪三等。”^[69]（卷八，P121-122）不准以锦为首的若干物品运往西部、北部边防地区贸易，否则按匹数计赃，减赃罪三等治罪。目的是不准流入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

北宋中期的法律规定：“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其锦、绣、织成，亦不得将过岭外……如有缘身衣服，不在禁例。其西边、北边诸关外户口须作衣服者，申牒官司，计其口数斟量，听于内地市取，仍牒关勘过。”^[70]（关市令卷第二五（补亡令附），P309）与宋初不同的主要有一收一放两点，一收是禁锦流通区域扩大到岭南的两广地区，一放是西北边防地区居民需要制作锦衣时，可以向官方申报到内地购买，但不能超出本家户口数量的额度。宋代有文字游戏的段子云：“有商人姓任名余任，贩金与锦至关，关吏告之曰：‘任余任任入，金锦禁急。’”^[71]（卷上，P1）反映的就是实际情况。联想到宋真宗朝曾“禁止陕西州军将黑漆、朱红于北界货鬻”^[27]（兵二七之二〇，P9192），说明宋朝压抑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对美好色彩的追求。

锦无疑属于奢侈品，而传统文化历来反对奢侈，宋代就经常限制或禁止锦的制造与使用。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即“诏川、峡诸州官织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悉罢之，民间勿禁”^[10]（卷四《太宗纪》，P68）。朝廷的绫锦院有锦绮机400余，刚即位的宋真宗指示：“锦绮非军国常须，可令悉改织绢。”^[2]（卷四三，咸平元年九月丁丑，P917）但不久便故态复萌。天圣四年（1026）又有诏令：“绫锦院自今不得衷私织造异色花纹匹段及御服颜色机样，委本院监官觉察，并许人陈首，所犯人当行严断。”^[27]（食货六四之二一，P7743）绫锦院是朝廷织锦的作坊，只能按照规定的花色织锦，严禁任意织造其他花色，也即官锦的色彩和图案是朝廷意志的体现，具有法定的严肃性。对于锦的使用范围，也屡有禁令。如景祐元年（1034），“禁民间织锦刺绣为服饰。西川岁织锦上供亦罢之”^[10]（卷一〇《仁宗纪》，P198）。禁止百姓织造和服用锦。景祐三年又诏令：非命妇之家“凡帐幔、缴壁、承尘、柱衣、额道、项帕、覆旌、床裙，毋得用纯锦遍绣”^[10]（卷一五三《舆服志》，P3576）。家中没有命妇的人户，室内各种装饰用品不准用锦。都是为了反对奢侈，倡导节俭。但实际上与宋朝其他禁令一样，也是禁而不止。

（三）锦的民间流通

锦的奇特性，还有两个表现。一是不列入赋税，《宋史·食货志》载赋税中有“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

纱，五曰縠，六曰紬，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唯独没有锦。二是不进入市场，宋仁宗有诏令言：“织文之奢，不鬻于国市。”^[72]（卷一九九《禁锦背绣遍地透背等诏》，P737）正如宋初吴淑所言：“虽其价如金，而不鬻于市。”^[73]（卷一〇《锦赋》，P889）一般也不在市场上自由买卖。

作为商品的锦，主要有官民贸易。如官府向民间购买：“益、梓路转运使岁市绫锦、鹿胎万二千，特与减半。”^[2]（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壬午，P3721）就是官府每年向机户等买锦。另有官府向民间派卖锦：绍兴年间，激赏库“卖锦三千余匹，系曹泳行下江浙诸州办卖”，宋高宗说：“如敷出许多锦帛，决致科扰，岂可不禁？”予以收缴。^[74]（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戊午，P3226）官府对民间无论是买还是卖，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统购统销，都具有强制性。

南宋时期，整个国防形势和经济地理发生很大变化，北宋政府关于锦流通的地域限制被打破，私人交易开始活跃起来。从此大大提升了锦的商品地位，使锦与国防密切相关。设在四川的都大提举茶马司，原来负责以茶交换西北与西南少数民族的马匹，建炎三年（1129），“始织造锦绫被褥，折支黎州等处马价，自是私贩之禁兴。又以应天、北禅、鹿苑寺三处，置场织造。其锦自真红被褥而下，凡十余品。于是中国织纹之工，转而衣衫椎髻鸩舌之人矣。……盖马政既重，则织造益多，费用益伙，堤防益密，其势然也”^[39]（费著《蜀锦谱》，P76）。大量向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输出锦，以换取马匹，私商贩锦开始解禁。主要有两条贩运商道。一是四川至广西钦州，这是合法的商业行为：“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75]（卷五《钦州博易场》，P196）富商大贾从四川贩锦运到钦州出售，再买当地的香到四川，一趟的贸易额可达数千贯。二是从广西兴安到福建，这是非法的走私行为：静江府兴安商人私自贩运禁榷的水银到建阳、邵武，“买异色锦私，涉宜州蛮界，至邕州溪洞，邀蛮人教止易银，而以私锦售易之。官价，锦当银三十五两，私锦只十五两。致官锦无用。独一色银，易马不足。且诱省地民负荷而缚卖之，或夹带奸细”^[476]（卷四二《论广西买马大弊札子》，P741）。以兴安水银贩至福建，然后购买当地私锦，再贩运到广西宜州少数民族地区，要求以银买锦。由于私锦价格仅是官锦的42.8%，导致官锦卖不出去，影响了买马。

尽管如此，在内地底层百姓间，锦并不容易见到。曾有市民见邻家有“锦绷婴儿”，“疑非市井间所育者”，于是报官，果然是盗取武将的孩子。^[52]（支甲卷一《五郎君》，P718）即使在产锦的福建，也是如此。洪迈记载：“福建诸州大抵皆有蛊毒，而福之古田、长溪为最。……五色线，凡是蛊喜食锦，锦不可得，乃以此代。”^[52]（志补卷二三《黄谷蛊毒》，P1761、P1763）由于锦稀缺，只好用五色线替代。但特殊情况下也有锦在民间出现，如“金蚕毒始蜀中，近及湖、广、闽、粤寝多。有人或舍此去，则谓之‘嫁金蚕’。率以黄金、钗器、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焉”^[77]（卷六，P104）。以锦、金为诱饵，使贪婪者带走金蚕毒。

（四）宋锦在后代的影响和流传

宋代精美的锦，由于珍贵且便于收藏，多有流传到后代者，且光彩不减。

明代常见以宋锦比喻美景和诗文。如有人“九月过楚新化道中，见孤峦五采，丽如宋锦，作诗云：‘谁说书生行路难，枫峦如锦向人妍’”^[78]（卷七《杂篇》，P160）。秋季满山遍野的植被五彩缤纷，像宋锦一样壮丽。明代著名学者姚旅，夸赞诗人徐惟起《古意新声》诗道：“以宋锦裁新衣，彩色夺目，当与并驱。”^[78]（卷三《韵篇上》，P93）令明人赞不绝口的，仍然是宋锦夺目的色彩。故而倍受追捧，明朝官员李乐指出：“今天下诸事慕古，衣尚唐段、宋锦。”^[79]（卷六《六十九》，P632）名宦孟一脉上书指责万历年间的奢侈之风：“今则以一物之微，而常兼中人数家之产……周鼎商彝、秦铉汉鉴、唐孟宋锦、汝磁宣窑，可致之宝，骈至叠出，钻求于四方，而售高价于东南。”^[80]（卷一，孟一脉《圣治类急救时弊以崇圣德以图万世治安疏》，P82）宋锦列入顶尖古玩、奢侈品。乃至明朝一度禁止民间仿制、服用宋锦。^[81]（卷二二《我朝服制》，P345）权相严嵩被抄家的物品中，就有“宋锦一百一十七匹”，以及“宋锦、葛、貂裘、丝布、酒线共一千三百零四件”^[81]（卷三五《严嵩》，P534），服装足以证明其贪婪和宋锦之高贵。至清朝，仍有“锦向以宋织为上”^[82]（秘集卷五《宋锦》，P1213）之誉。并感叹“宋锦花纹亦遂成广陵散”^[83]（卷二五《宋锦》，P1365），即已经成为绝响，表示宋代美锦技艺的不可企及。

至于随着名古书画传下的宋锦就更多了。如明代邝露《卖书》诗云：“天书出尚方，宋锦内家装。赐日多珍惜，售时不厌忙。”^[84]（卷五《卖书》，P299）清初苏州有人高价购买宋太宗朝摹刻的《淳化阁帖》十帙，“每帙悉以宋锦装，其前后锦之花纹二十种，各

不相犯……则揭取其锦二十片，货于吴中机房为样，竟获重利”^[82]（《秘集卷五《宋锦》，P1213-1214》）。由此重新织造宋锦。苏州此类织锦被称为“宋锦”，实际上是“仿宋锦”，一直延续至今。当代史学界以外论著中提到的宋锦，基本都是苏州宋锦。2006年，苏州宋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是宋锦的余晖流韵。

五、结语

宋代锦是色彩美的丝织表现，是有形状、有灵魂的文化色彩，既有很高的使用价值，更有很高的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作为工艺美术，宋人以梭子为笔，彩丝为颜料，匠心独运，织出精妙的图画。这种如绘如绣的艺术形式，虽非宋人发明，却由宋人发挥到极致，遂成空前绝后的工艺美术作品。借用当代新出现的“低美感社会”概念，宋代无疑是“高美感社会”。从色彩视野观察宋代的锦，我们看到宋锦灿若朝霞，美过鲜花，是宋代色彩文化的一个结晶，在中国色彩史、彩帛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锦所饱含的诸多宋代历史文化密码有待于破解，对锦的研究，不仅是艺术学界和纺织界的事，也是史学界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宋)陈彭年, 邱雍. 重修广韵[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236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 (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3] (宋)高承. 事物纪原[M]. (明)李果, 订. 金圆, 许沛藻,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4] (明)杨慎. 全蜀艺文志[M]. 刘琳, 王晓波, 点校. 北京: 线装书局, 2003.
- [5] (宋)熊禾. 勿轩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188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6] (宋)晁说之. 嵩山文集[M]. 四部丛刊续编本: 第 383 册.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5.
- [7] 曾枣庄. 宋代序跋全编[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5.
- [8] (宋)张君房. 云笈七签[M]. 蒋力生, 校注.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
- [9] (宋)赵湘. 南阳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086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0] (元)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1] 王庄穆. 中国丝绸辞典[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 [12] (宋)范祖禹. 范太史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100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3] (宋)陈著. 本堂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185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4] (宋)邵雍. 邵雍全集[M]. 郭彧, 于天宝,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15] (宋)慕容彦逢. 摘文堂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123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 [16] (宋)晁补之. 鸡肋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18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7] (宋)陈起. 江湖小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357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8] (宋)范成大. 范村梅谱: 外十二种[M]. 刘向培, 整理校点.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
- [19] (宋)白玉蟾. 白玉蟾真人全集[M]. 陆文荣, 统筹. 六六道人, 辑纂.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16.
- [20] (宋)陈景沂, 祝穆. 全芳备祖[M]. 程杰, 王三毛, 点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 [21] (宋)黄庭坚. 黄庭坚全集[M]. 刘琳, 李勇先, 王蓉贵, 校点.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 [22] (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M]. 赵一生, 点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 [23] (宋)叶廷珪. 海录碎事[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921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4] (宋)陈公亮, 刘文富. (淳熙)严州图经[M].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9.
- [25] (宋)刘辰翁. 须溪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86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6] (宋)何梦桂. 何梦桂集[M]. 赵敏, 崔霞, 点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 [27] (清)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刘琳, 刁忠民, 舒大刚, 尹波等, 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28] (宋)佚名. 翰苑新书[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950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9] (宋)秦观. 淮海集笺注[M]. 徐培均, 笺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30] (宋)朱弁. 曲洧旧闻[M]. 孔凡礼,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 [31] 梁思成. 《营造法式》注释[M]. 北京:三联书店, 2013.
- [32] 陈彤. 故宫本《营造法式》图样研究(三)——《营造法式》彩画锦纹探微[J].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 2016, (2).
- [33] (宋)王与之. 周礼订义[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94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34] (宋)刘才邵. 榭溪居士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30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35] (宋)西湖老人. 繁盛录[M]. 黄纯艳, 整理. 全宋笔记:第 83 册.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9.
- [36] (宋)宋敏求. 春明退朝录[M]. 诚刚,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37] (宋)吕祖谦. 吕祖谦全集[M]. 黄灵庚, 吴战垒, 主编.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

-
- [38] (宋)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M]. 王其祗, 校点.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 [39] (宋)佚名. 百宝总珍集(外四种)[M]. 李音翰, 朱学博, 整理校点.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 [40] (宋)郑居中. 政和五礼新仪[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647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41] (宋)俞琰. 林屋山人漫稿[Z]. 中国基本古籍库, 清抄本.
- [42] (宋)曹勋. 松隐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129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43] (宋)余靖. 武溪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089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44] (宋)毛滂. 毛滂集[M]. 周少雄, 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 [45] (明)张应文. 清秘藏[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872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46] (宋)吴曾. 能改斋漫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47] (宋)周密. 武林旧事[M]. 范茨, 整理. 全宋笔记: 第 97 册.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9.
- [48] (宋)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M].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校点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49] (宋)孔文仲, 孔武仲, 孔平仲. 清江三孔集[M]. 孙永选, 校点. 济南: 齐鲁书社, 2002.
- [50] 苏轼词编年校注[M]. 邹同庆, 王宗堂,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51] (宋)黄震. 黄震全集[M]. 张伟, 何忠礼, 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 [52] (宋)洪迈. 夷坚志[M]. 何卓,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53] (宋)陶谷. 清异录[M]. 郑村声, 俞钢, 整理. 全宋笔记: 第 2 册.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9.
- [54] (宋)罗大经. 鹤林玉露[M]. 王瑞来,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5] (宋)蒋叔舆. 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M]. 道藏: 第 9 册. 北京: 文物出版社, 上海: 上海书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 [56] (宋)邓深. 邓绅伯集[Z]. 中国基本古籍库, 民国宜秋馆刻本.
- [57] (宋)赵汝籙. 野谷诗稿[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175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58] (宋)王辟之. 澠水燕谈录[M]. 吕友仁,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59] (宋)蔡襄. 蔡襄集[M]. 吴以宁,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 [60] (宋)何蘧. 春渚纪闻[M]. 张明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61] (日)成寻. 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M]. 王丽萍,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62] (宋)句延庆. 锦里耆旧传[M]. 储玲玲, 整理. 全宋笔记: 第6册.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9.
- [63] (宋)周密. 癸辛杂识[M]. 吴企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64] (宋)陈均.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M]. 许沛藻, 金圆, 顾吉辰, 孙菊园,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65] (宋)刘安上. 给事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1124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66] (元)陶宗仪. 说郛[M]. 北京: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6.
- [67] (宋)刘攽. 彭城集[M]. 逯钦立, 点校. 济南: 齐鲁书社, 2018.
- [68] (宋)晁公溯. 嵩山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1139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69] (宋)竦仪. 宋刑统校证[M]. 岳纯之, 校证.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70]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M]. 天一阁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 校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71] (宋)庄绰. 鸡肋编[M]. 萧鲁阳,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72] 宋大诏令集[M]. 司义祖, 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73] (宋)吴淑. 事类赋[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892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74] (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胡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75] (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M]. 杨武泉,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76] (宋)范成大. 范成大集[M]. 辛更儒,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 [77] (宋)蔡绦. 铁围山丛谈[M]. 冯惠民, 沈锡麟,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78] (明)姚旅. 露书[M]. 刘彦捷, 点校.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 [79] (明)李乐. 见闻杂纪[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80] (明)吴亮. 万历疏钞[Z]. 中国基本古籍库, 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81] (明)田艺蘅. 留青日札[M]. 朱碧莲, 点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82] (清)褚人获. 坚瓠集[M]. 李梦生, 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83] (清)俞樾. 茶香室三钞[M]. 卓凡, 顾馨, 徐敏霞,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1995.

[84] (明)邝露. 峤雅[M]. 黄灼耀, 校点. 杨明新, 注释.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注释:

1 直接相关的论文, 有李斌、刘安定、李强、叶洪光《宋锦起源及其出现原因的研究》(《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探讨了苏州“宋锦”织造工艺的起源和宋以后仿制的起源。艺术、工艺学界近年对隋唐的锦有所关注, 如: 魏丽《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特点——以莫谢瓦亚·巴勒卡出土的锦袍为例》(《艺术设计研究》2021年第3期), 张静《粟特锦纹样对唐锦纹样设计的影响——以翼马纹为例》(《西部皮革》2021年第13期), 彭进钰、王欢《紫地狮子奏乐纹锦残片纹样复原》(《化纤与纺织技术》2021年第6期)。

2 按红、绯原本属于间色, 但宋人一般不区分纺织品的赤、红、绯, 多以红代之, 故将红、绯锦列此。

3 言“在京及真定府织”者等, 各按半数计。

4 “买异色锦私”, 原作“卖异色锦私”, 误, 据文意改。